

“第一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高翔 江沛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于2018年4月13—15日在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和经济史研究专家参加。共收到投稿227篇，经过专家评审选出50篇参会。会议分10场分论坛进行，各位青年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均进行了翔实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名家，如李伯重、张忠民、仲伟民、魏明孔、许檀、张利民、周黎安、李金铮、魏众和高超群等，主持各分论坛，并对参会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青年学者间亦有思想和学术上的激烈交锋。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按专题综述如下。

一、理论与视角的探索

易棉阳和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求真、求解与求用:经济史学功能论》将经济史学的功能概括为求真、求解和求用,认为三者不可分割。经济史研究应在侧重一方的同时兼顾其他两方。孙圣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浅议经济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现实意义——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反思之前言》则就经济学假设与经济学适用范围等多个方面展开探讨,重点探究为什么要从经济史学和方法论来反思西方经济学。张天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启示》总结了《中国历史的模式》在西方学界的反响、学术上的宝贵之处和对当今学者的启示,认为这一经典著作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徐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圩田、沙田与垸田:水域围垦史的几种研究理路》回顾了前人关于水域围垦史的多种研究理路,认为江汉—洞庭地区的垸田导致水旱灾的频发,可探索出水域围垦史的另一条解释路径。

二、金融史研究

在金融史领域主要关注明清以来货币体系的演进。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指出,由于国家“救市”失败和民间私铸难以禁治,使“格雷欣法则”在景泰至嘉靖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极致,最终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进入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之势。马琦(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清中期的铜铅运销与币材供给》认为,清中期西南边疆矿业的勃兴是政府应对前期币材危机的结果,外销区域的扩展,形成以云贵为源头,辐射全国,并以水陆联运的铜铅运销体系,构成涵盖全国的币材供给格局。熊昌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论述了机制标准化银元逐步在近代中国确立主币地位的过程和理论依据。郭本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大小券问题的“蝴蝶效应”——抗战时期国民党辅币体系的崩坏》梳理了抗战期间国统区内辅币短缺所引发的大小券问题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认为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通货膨胀及自身腐败问题,最终导致国民党的辅币系统在抗战胜利前基本崩溃。

除货币研究外,石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秦汉时期借贷的期限与收息周期》利用已有材料和新公布的秦汉简牍,对秦汉时期的借贷期限和收息周期进行归纳,并对不同类型借贷期限和取息周期的存在背景进行探讨。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社会资本与民国时期的农户

借贷——基于伪满洲国调查的分析》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国调查所载华北农户的借贷交易,发掘社会资本在民间借贷中的作用。

三、产业与市场发展

本次会议对产业发展的谈论主要集中于近代工业。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巴斯·范鲁文(荷兰国际社史研究所)的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long the Yangtze and Zhujiang Rivers, ca. 1915 - 2004* 利用1915至2004年的工业统计资料,对广东、广西、江苏、安徽和上海的区域工业结构展开研究,通过数据整理和建立经济模型展现近百年来长江及珠江流域区域工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孙彦和樊卫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近代上海机械缫丝工业劳动力契约制度制约技术进步研究》使用威廉姆森关于劳动力契约关系的理论分析工具,揭示连续现货计时劳动力契约模式是制约近代上海机械缫丝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1908—194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再估算》借助上海档案馆的工业用电量数据,对近代中后期上海工业总产值进行较可靠的估算,并用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二重佐证。魏晓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工业企业接管与改造中的薪资改革——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梳理解放后西北实业公司的历次薪资调整与改革,指出通过改革,工人工资提升,公司生产稳步向前。奖励制度的确立,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此外,吕兴邦(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化私为官”:清末硝磺新政与县域效应——以四川省南部县为考察中心》着眼于清末的硝磺产业由军政型限产采买制向商业开发型官运商销体系的转变,对转变的背景、具体实施过程、新政下硝磺禁私态势变化等问题展开剖析。赵劲松(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e-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Young Brother Bank* 利用杨氏兄弟银行(Young Brother Bank)的档案,发现近代中国家族企业会采取将家族外政治实力人物纳入董事会的做法,以确保其在战乱年代的存续。常明明(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路径取向——基于〈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文献解读》通过研究土地改革后中南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阶级变化等方面,剖析农村经济摒弃“先工业化再集体化”路径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当今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得到青年学者们的热议。李晓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通过梳理明代两广盐区中广东和海北、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地区的盐场间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展现市场在盐政变革中的意义。刘丛(上海财经大学)和颜色(北京大学)的 *Elites and the Stat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the Grain Market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通过建立一个地区级的面板数据,对18世纪中国地方士绅在稳定粮价上的重要作用进行量化研究。胡鹏(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李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19世纪华北粮食贸易的方式与路线选择——基于运输成本视角的量化分析》估算了19世纪华北府(州)间小麦贸易的运输成本,发现最优的贸易路线是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邵俊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的《民国时期直隶地区集市的空间体系研究——兼论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利用民国时期直隶地区区域内部分平原县的地方志资料和地理学方法,考察了集市的层级和空间体系。王哲(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研究——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分析》则用泰森多边形法对近代四川邮政展开研究,发现基层邮政服务区与基层定期集市服务区基本吻合,从而为全国范围内建构近代基层市场网络提供了很好的技术路线,亦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谢开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典产的处置机制:以法律和契约为中心——兼论典交易的效率》以清代至民国的法律和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典契约为中心,对出典人未在约定典期内回赎典产时,如何处置典产进行分析,认为典不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土

地交易方式,反而是一种高效的制度安排。水海刚(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的《战前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侨小型商号的日常经营——新加坡白三春茶行商业信函初探(1927—1932)》利用茶行“白三春”留存的商业信函,对其二战前的日常商业运营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加深理解近代海外华商贸易网络的运营逻辑。娄敏(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伙贸融资:组合伙贸的融资机制与风险》以江津县工商联档案为核心资料,就组合伙贸的形成及特征、组合伙贸的市场策略、身份、伙贸的连带责任和债权均等展开研究。燕红忠和李裕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的《近代中国内汇市场的发展及其特点》主要从汇兑经营主体、汇兑方式和汇兑网络关系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内汇市场的发展演变过程、机制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

四、经济制度变迁

对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是此次会议的另一热点。周曲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从“籍帐”到“帐簿”——〈天圣令〉所见唐宋间户口赋役管理文书形态的演进》认为相对于唐代中央地方一体贯通的“籍帐”文书体制,宋代的中央和地方借助不同形态的文书,在户口赋役管理事务上体现出明显的权责分野。黄雅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从社到庄:清代山东顺庄法推行的前后演变》针对清代乾隆年间山东省寿光县推行顺庄法这一个案,揭示里甲制度在乡村社会中的运行最终被村庄所取代的过程,认为赋税方面的改变是因地制宜的结果。郭永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计量经济史中心)的《“多县治府”与“削府利县”:清代府县裁设与财政经费调整》通过梳理湖南方志及赋役全书中的文本、财政细目及地图等相关资料,探讨了府州县在调整之后的经费与编制的对应关系。倪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指出咸同时期,清政府在奏销制度、税收征收与分配主体、租税结构和财政指导思想上发生较大转型,认为这是时局影响和财政实践的共同结果。任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着重探讨了1845至1853年清政府的财政困境和应对措施,指出清政府受自身行动能力限制,终无法满足其财政需要。

雷鸣、李飞跃、刘莹和陈月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新教、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一个基于山东近代新教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在近代山东,基督教这一非正式制度有力推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李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殖民统治的遗产:近代东北铁路附属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历史计量方法,对比了近代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铁路附属地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日本不仅直接投资建厂,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还通过提供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飞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抗日战争的经济遗产:国家能力与经济转型》认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培养的基层干部与精英在1949年后的基层治理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经济转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关永强和赵雪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国民政府时期主计处统计局研究(1931—1949)》系统考察了国民政府于1931年设立的主计处统计局,并对其主持下的各项统计和调查工作,以及近代中国政府的统计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政策选择——20世纪60年代半计件工资制的实施》对1962—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半计件工资制”的产生背景、实施过程和各方反映进行揭示和分析,并探讨产生制度差异的核心因素。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从计划到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国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以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为中心》认为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其中以“调改结合”为路径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黄义衡(克莱姆森大学)和刘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道路的特区路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平台》认为特区路径既是中国道路中制度创新的核心机制之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涵。

五、近代经济与社会

关于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参会学者主要关注近代社会群体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祁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杂捐体制的变迁与绅士的浮沉——以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代上海南市的财政治理为中心(1905—1923)》关注清末民初的上海绅商群体,认为当地绅商出于对地方权力的渴望和知识结构的限制,既未改变任意杂捐摊派的旧财政体制,也未动员底层民众反抗军人政权的恣意压榨。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物价飞涨的应对之道:1946—1949年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制度研究》利用各类档案、报刊和日记等资料,全面考察了1946—1949年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的制定程序、功效、历史演变及其弊端,进而窥视在战后上海物价飞涨的现实困境下,国民政府在调适与工人团体关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缺陷和经验教训。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清华留美预备部留美同学的职业发展研究》着力探讨清华预备部留美同学归国后职业分布格局与变迁轨迹,以及背后存在的同学间职业交叉和社会关系等,以新的视角来理解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的复杂互动。张亚光和侯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何以去国?近代海外留学生的籍贯和经费》则认为区域宏观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末各省自费和官费留学政策的制定,而区域经济状况、自费和官费留学政策也影响着这一时期留学生籍贯的分布。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金陵大学的经费来源与运作研究(1910—1949)》则关注金陵大学这一近代教育机构,研究了经费不同来源的主体与金陵大学办学取向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经费补助对金陵大学产生的多重影响。黄英伟和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土账本(1936—1942)的证据》通过对私人账本的个案研究,发掘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人民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毛立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近代香港社会买卖和奴役底层人口问题探析》着眼于近代香港身为家仆或淫业体制下的底层社会人口,力求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去重新揭示相关历史问题的复杂面相。方万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资源区位、技术工具与区域社会——水力磨坊与明清以降的西北地方社会》则另辟蹊径,从技术史和社会史角度出发,认为西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定的水力资源区位,从而为水力磨坊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六、其他

除上述方面外,彭凯翔(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试探传统中国人均生活水平的长期变迁:10至19世纪》通过定量研究,支持了前人关于10至19世纪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均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定性讨论。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李丹柯(费尔菲尔德大学)的《张肖梅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调查及研究》关注民国精英女性张肖梅,认为她引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发展走向,对战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刘成虎和高宇(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的《日本战时蒙疆产鸦片供求调节政策探析》以蒙疆的鸦片供求调节政策为中心,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进行探讨,更加全面地揭示了日本的罪恶侵略行径。皇甫秋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与战后中美经济合作》利用中外档案和报刊资料,考察中美工商业协进会的组建和与中美政府的互动,认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片面解读中国形势,对美国政府和工商界均产生严重误导,成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入选此次会议的论文多是问题意识强烈,创新意识明显,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和制度变迁等重要问题多有集中讨论,研究领域涉及产业发展、市场流通、货币体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互动等诸方面,在经济史理论研究上也有所探讨。这些特点也体现出此次参会青年学者的良好学术素养、视野和认知,代表着中国经济史研究未来的方向及希望。

(责任编辑:王姣娜)